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蔡 昉

【提要】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新世纪保持经济增长源泉需要政府继续实施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为宗旨的人口政策。本文用制度分析方法讨论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动因和时机,并通过揭示中国改革整体逻辑与渐进步骤之间的关系、人口转变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综合性质,论证了这一改革的重心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以及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的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进入全国性的高潮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人口类型的转变。然而,在新时期,一方面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另一方面一系列与人口相关的新问题、新挑战被提了出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解决好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人口问题,现实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本文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已经进行的改革探索,从理论和政策方面对这场深刻改革进行探讨。

一、改革的动因与时机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模式的改革,与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都是制度变迁过程,即制度安排的改变。当现行的制度安排不再是所有可以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有效的一种时,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就显示出潜在的制度收益。这时,就出现所谓的制度不均衡状况——其他的制度安排替代现行制度安排,可以提高制度收益或降低制度成本。

让我们以图1来说明制度变迁的机理。既定的制度供给是针对特定的制度需求,以最小化成本为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存量。制度均衡取决于制度供给曲线与制度需求曲线的交叉。制度供给与需求两条曲线分别向上和向下倾斜。我们假设最初的制度安排的均衡点为 Q_0 ,此时的制度成本为 C_0 。当社会对制度的需求发生变化,即提出更高的服务要求时,意味着制度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①,如果制度不变,即供给曲线不发生移动,新的制度均衡会发生在较高的制度成本水平上,此时制度均衡点为 Q_1 ,制度成本为 C_1 。这是因为新的制度需求超出了既定制度供给的能力,与原来的制度

^① 林毅夫(1991)归纳了四种引起制度不均衡的原因:(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2)技术的变化;(3)对制度服务需求的变化;(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化。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中出现的制度不均衡,实际上是对上述所有方面变化作出的反应,但我们这里只以制度需求变化为例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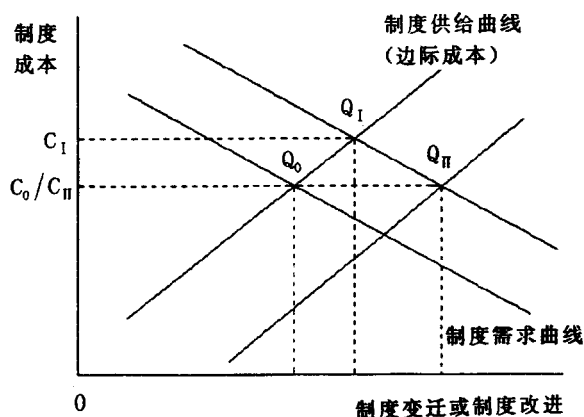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均衡、制度成本与制度变迁

度安排。在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之初,中国经济表现为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即在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增长率上,人均收入在仅仅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形成一种均衡状态,即使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也会由于同时诱导出人口增长率上升,从而再次将人均收入水平压低,在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上达到均衡。从这种经济增长假说出发,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通过某种“大推进”式的资本积累和投资活动,把人均资本一下子提高到远离人口增长可以消耗掉的水平;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抑制人口增长,从而相对提高人均资本占有水平。这两种方式都着眼于人为地提高资本积累水平,企望一旦超越低水平均衡陷阱,经济发展就可以进入自我促进的正常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试图人为提高资本积累水平,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一种努力。在推行这种发展战略的早期阶段,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种促进资本积累率的发展战略,足以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迅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严格的控制。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有效地提高了资本积累率,加快了重工业发展,但同时也由于相应的体制弊端,造成激励机制不足,技术效率低下,并且由于重工业高度资金密集的特点,抑制了劳动力就业的扩大。因此,控制人口的可能性得到逐渐的政策认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注意到人口问题对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因而在一些地区鼓励和推动计划生育活动。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79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人口转变的型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问题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体制模式,而选择了控制人口这条途径。虽然低效率是传统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体制模式造成的,而不是人口造成的后果,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的确对于缓解就业压力、资源压力,以及环境压力具有积极的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更重要的贡献,与其直接说在于人口数量得到控制,不如说因为减少了人口数量而导致人口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由于其他资源的有限性,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具有某种此长彼消的关系。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在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终究要在养活更多数量的孩子与对较少的孩子做出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由于人口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中国人力资本的改善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对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计量经济学估算,在1978~1998年期间,年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中,人力资本的贡献占24%(蔡昉、王德文,1999)。

虽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长期具有国策的地位,但毋庸讳言的是,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是与传统经济体制相伴而生的,具有浓厚的计划

均衡点相比,这时制度成本提高了,意味着制度不均衡的出现,这时会有一种可供替代的制度安排。一旦引进这种可以节约制度成本的新的制度安排,在图1中就表现为制度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通常会降低制度成本。我们假设有一种制度安排,恰好可以把制度成本降低到最初制度均衡点的水平。在图1中表现为新的制度均衡点为 Q_{II} ,新的制度成本水平为 C_{II} ,又回到原来的水平。这个过程,就是适应制度需求变化而发生的制度变迁。

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与完善的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制度

经济与行政命令的色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这种管理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与传统的管理机制之间产生了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庭的决策职能被抹煞了,生育子女的决策与经济决策一起被纳入国家计划及集体决策,也是那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时,政府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育控制权威,关键在于健全的和强有力的基层计划生育组织体系。然而,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传统的农村社区组织的经济职能弱化,组织体系松弛。由此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农村基层,社区组织控制生育的能力也相应减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人口增长不能完全在计划控制之内。

第二,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不能适应“提高人口素质”目标的要求。21世纪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过去20余年的高速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水平。人力资本形成的源泉在于教育与健康水平的提高,而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为基础教育提供了新的机会,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则对养老和医疗保障提出了挑战。通过观察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机会与挑战,以及展示在新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人力资本积累面临的任務,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而传统的管理机制着眼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其有效性也主要体现在生育率控制方面,还没有形成提高人口素质的有效办法。

第三,传统人口管理机制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提高。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有高度的流动性,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研究显示,改革以来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高达20%,几乎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的贡献持平(蔡昉、王德文,1999)。目前,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口大约有8000万左右,且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其中的女性基本上都处于生育年龄。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往往不能把这些流动人口纳入自己的管理与服务范围。

第四,传统的管理机制不能适应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新内涵。中国和国际经验都越来越显示出一种趋势,计划生育单靠限制育龄人口的生育数量是简单化的,而一系列与妇女的生殖健康相关的服务,以及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更有助于降低她们及其家庭的生育意愿,从而使个人和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的政策目标相一致,使计划生育政策手段与家庭生育决策激励相容。现行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以生育控制为目标,以行政管理为手段的,与人口政策的新内涵不相适应。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有所上升,就是这种不适应性的表现。

最后,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与法制建设的要求和目标不相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是法制建设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办奥运会,以及加入一系列其他国际公约,中国行政管理也将日益融入国际法的框架。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正在积极制定过程中。在这种大趋势、大潮流之下,以往的以人治代替法治,以管理代替服务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已不再适应。

可见,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新的制度需求已经被紧迫地提了出来。如果与此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不能相应地得到供给,就势必出现制度真空,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时期任务就难以实现。因此,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紧迫性已经表现出来,时机已臻成熟。

二、改革的整体逻辑与渐进步骤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其渐进性,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于世。从迄今为止的改革步骤来看,大多数成功的改革推进基本上是局部性的、增量性的和试验性的。然而,更进一步地观察过去20余

年的改革,在局部性改革中体现着整体推进,增量性改革最终导致了存量的调整,试验性改革导致总体模式的日益清晰化。我们通过分析改革以前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和组成部分,即可理解这种渐进式改革的逻辑。

传统体制模式的形成逻辑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为起点,相继形成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林毅夫等,1999)。而改革的顺序却与此相反,是从微观经营机制上突破的。因为传统体制的弊端最直接地体现在微观经营环节的效率低下和激励不足,所以在这个环节进行改革最有针对性。此外,从这里进行改革不触及人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最容易取得突破。微观经营环节自主权的获得,激励和效率的提高,导致新增资源在计划之外的配置,从而需要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进一步进行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改革。由于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体制三者之间具有内部统一性,从微观经营环节开始的改革,最后产生对其他环节改革的推动,使改革具有自我推进的性质。尽管局部性的改革也会造成整个体制的不协调,导致企业投资失控、寻求资源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等,但传统体制模式本身的完整性使得局部性改革终究是有逻辑的,方向也是明确的,最终结果是汇成一个整体改革的画卷。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的改革,迄今已经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一段时期的试验与局部推进。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计划生育工作就逐渐同发展农村经济、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扶贫减贫,以及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各级计划生育管理机构试验了各种方式,力求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体现更多的物质利益原则,相应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因此而逐渐形成了中国计划生育的新特点:以服务为宗旨、以群众为基础、以妇女为中心、以基层为重点,与发展相结合的生殖健康服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 and 生殖健康服务网络逐步完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普遍在县一级,以及相当多的乡镇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让我们从家庭生育决策与社会决策之间的差异与统一这对矛盾的解决,看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决策单位,除了对生产过程、劳动力配置、消费安排作出最优化的决策之外,家庭成员的数量也是其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纯粹微观的决策过程来看,一个家庭在决定子女数量时,也是要经过一番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和斟酌的。家庭总是把生育孩子的数量定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这时的生育数量即是家庭生育决策的均衡点。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虽然我们从统计分析上,既不能把人口增长归结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也不能说高的人口增长率一定会降低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但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增长过快也确实可能引起负面效应。就拿人口转变过程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第二个阶段上死亡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身内在发展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发达国家先进医疗卫生技术的扩散效果。所以,发展中国家较早到来的死亡率下降,使得生育率的调整显得有所滞后。

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特别是一个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增大的人口规模,会造成家庭、社会对人口规模作出反应和调整的时间过短,所以,可能从两个方面对于人均收入或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在家庭内部。一个过大的家庭规模,可能会减少对每一个孩子身上投入的家庭资源和时间,因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多生子女导致生育间隔短,母亲和子女的健康都会受到不利影响,降低家庭持续生产能力。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孩子多意味着挣钱养家的人手就多。但最终由于不能通过改进人的质量而彻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所以这种家庭可能世代疲于奔命,而始终难以脱贫致富。第二个方面是对社会的影响。过快增长的人口,还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造成全社会人口结构生产性的降低。首先是导致低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提高少年儿童抚养系数。这与人口增长过慢导致老年抚养系数提高是一个道理。

由于家庭生育决策理性有时与人口增长的整体效果有所差异,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目标与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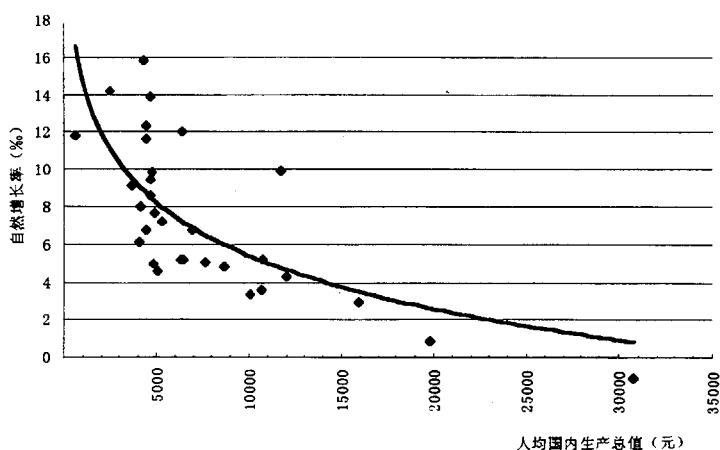
生育意愿不相一致,形成政策执行中的激励不相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之前,政府的目标可以不考虑老百姓意愿而加以贯彻。而迄今为止的局部改革经验表明,一旦把计划生育与发展农村经济、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扶贫减贫,以及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结合起来,并逐渐转向以生殖健康服务为主,家庭生育意愿就可以与整体社会目标相一致,并形成激励相容的局面。由此,看似局部的和分散的变化,从整体上构成了改革的逻辑,并逐渐趋近于目标模式——达到家庭生育意愿与政府目标的一致性。

三、人口转变阶段差异与改革重心

总体来看,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步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阶段。然而,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在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为不同省份之间特别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

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效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综合反映,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既产生于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所具有的区域差异,也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平衡。按照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划分三类地区(即把四川、重庆、广西和内蒙古归入西部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类型上的差异,1999年东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4.78‰,中部为6.97‰,西部地区为10.17‰。这种差异使我们感性观察到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我们将全国各个地区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看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反向变化的趋势(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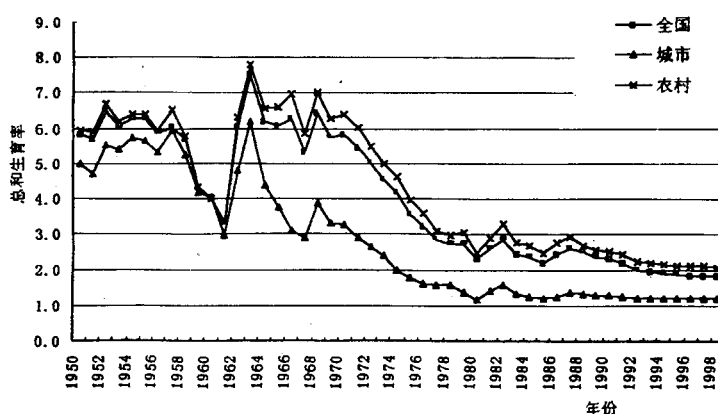
与三类地区之间差异相类似,人口转变类型的城乡差异也是巨大的,1999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67‰,农村仍高达9.25‰;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2的情况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大约为2.1。图3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和分城乡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过程及其差异。首先,总和生育率无论城乡都呈现出大幅度降低的趋势。其



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湖北、新疆、海南、吉林、内蒙古、湖南、河南、重庆、山西、安徽、青海、江西、宁夏、四川、云南、西藏、广西、陕西、甘肃、贵州。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图2 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的人口增长率(1999年)



资料来源:蔡昉主编:《2000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图3 全国、城市、农村总和生育率变化

次,农村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大大滞后于城市。再次,由图3可以看到,全国总和生育率与农村水平比较接近。这是因为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约70%以上,所以,其人口转变类型阶段制约着全国向更高的水平上提升。

显而易见的是,东、中、西三类地区,以及农村和城市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上处于不同的阶段。由于人口转变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预期人口转变的地区和城乡差距将长期存在,人口数量控制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仍然是最重要的人口政策目标。这里,我们在观察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时,只列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没有涉及因果关系。而根据已有的研究,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有助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人口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国家研究理事会,1995),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据都是充分的(Ahituv,2001)。

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引擎或源泉。在改革之前,经济增长依靠的是旨在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该战略利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计划机制吸收农业剩余,推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传统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是相互适应的。改革以来,经济增长靠市场化改革所释放出的制度变革效应。具体来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改革带来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蔡昉等,2001)。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市场机制,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显示出与新体制不相容的矛盾。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里,经济增长要保持高速度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改善。在增长经济学文献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为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而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帮助落后经济实现对发达经济的赶超(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9)。

1999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1%,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总额的58.8%,新增固定资产占全国的58.2%,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的50.0%;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45.1%,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总额的33.3%,新增固定资产占全国的29.2%,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的38.5%;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3.8%,国内生产总值却仅占全国总额的7.9%,新增固定资产占全国的12.6%,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的11.4%(国家统计局,2000)。可见,中西部地区不仅在物质生产力方面落后于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的落后更是显著。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改善,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也需要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为目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保障。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正是寻求自身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按照制度变迁是制度供给对制度需求变化作出反应的假说,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需求是最大的,因而改革也应该以这些地区为重心。

四、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于传统体制不能适应于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核心的一系列变化了的环境。目前,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诸多改革都在进行或在试验、酝酿之中。这些改革的领域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户籍制度、教育体制、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建设、农村税费改革、国有企业公司化等等。这些领域的改革与人口管理机制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之下彼此配套、互相补充,与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改革相比,普遍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配套性,都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资源分配和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化,是中国传统的发展战略和计划体制的基本特征。然而,对传统发展战略和体制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只要政府不再插手经济事务,只需分开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即使在比较充分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仍然在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职能或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几乎是中国所有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制定公共政策。一般来说,所谓公共政策,通常是指为了达到某种公共目的而支配全体人民行为的准则(Boulding, Kenneth Ewart, 1958:1)。因此,公共政策制定的要素包括:(1)所要达到的公共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2)达到该目标或解决该问题可供选择的手段;(3)达到目标或解决问题手段的选择问题(汤俊湘, 1980:1~2)。既然制定公共政策是政府的职能,所以政府职能的改变,必然涉及到如何制定公共政策的问题。人口过程是经济过程的一个内生系统。因此,中国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一经确立,新型人口控制机制的原则就十分清楚了。

第一,新的人口政策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施的,物质利益导向应该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市场机制并不必然与人口政策相对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目标也不必然与整体社会目标相抵触。在什么情况下市场机制和人口政策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是不一致的,一方面,会因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即人口政策发挥作用需要市场机制的配合;另一方面,对于特定的人口目标来说,如果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市场引导的方向一致,政策就容易取得成功;反之,政策将很难产生作用,甚至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验,证明了该政策无论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对个人、家庭脱贫奔小康,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而大量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以生殖健康为核心的各种服务,对于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更是具有不容忽视的效果。以广大城乡家庭特别是众多育龄妇女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将其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必将是适应于新型经济体制的有效模式。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或者说人口政策,是一项国策级的政府公共政策,因此,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人口政策不仅需要在依法行政的框架内实施,还要从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原则出发,与其他政府政策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配套的公共政策体系。迄今为止,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几乎是与市场化改革同步的。进一步的改革将触及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各种公共政策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激励相容性将显得格外重要。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将从直接的资源配置领域退出来,主要做那些个人、家庭和企业不适宜做的事情。从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角度,政府政策将集中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提供必要的生殖健康服务,把个人、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全社会的宏观目标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人口委员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和教育委员会国家研究理事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商务印书馆,1995年。
2. 巴罗、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3. 汤俊湘:《经济政策》,三民书局(中国台北),1980年。
4.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5.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7. 蔡昉、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9. Ahituv, Avner (2001), Be Fruitful or Multiply: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Fert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4:51-71.
10. Boulding, Kenneth Ewart (1958),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c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